

场景理论: 利用文化因素 推动城市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 吴 军

摘 要: 什么因素驱动着城市增长发展呢? 经典理论认为, 土地、劳动力、资金和管理等推动经济增长与人口流动, 影响消费行为与居住模式。但城市发展的人力资本模式则认为, 促进城市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和资本存量的增加, 而是人技能的提高与知识积累。在此基础上, 最近十年, 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在美国被提了出来, 即创意阶层模式。该理论认为, 在知识经济时代, 创意阶层是城市增长发展的重要资源, 是城市之间竞争的制胜关键。但是, 该理论并没有解决好“如何吸引聚集创意阶层”这个问题。随后, 新芝加哥学派提出了场景理论, 该理论聚焦市民文化参与对城市增长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 由便利设施为导向的公共物品集合形同不同场景, 以及场景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对不同人群产生聚集作用, 从而带来不同的城市结果。因此, 本文建议, 在考虑城市增长发展时, 城市政策不仅要考虑诸如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等要素, 还应把场景纳入进来, 从价值观、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上, 谋篇布局, 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人口流动以及改变其他社会进程等。

关键词: 文化参与 场景理论 城市发展 新芝加哥学派 城市研究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5675(2017) 02 - 08 - 175

一、城市增长发展动力的理论回顾

什么因素驱动着城市增长发展以及这种因素是如何发生呢? 这个问题一致备受社会科学界关注。经典理论认为, 土地、劳动力、资金和管理等作为生产要素, 推动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 影响消费行为与居住模式, 改变着社会进程。代表人物亚当

·斯密^[1] (Adam Smith, 1768)、卡尔·马克思^[2] (Karl Marx, 1867)、阿尔弗雷德·马歇尔^[3] (Alfred Marshall, 1890)。他们所诠释的理论视角是用生产来解释消费与居住。中国过去 30 年发展中多数城市采取了这样的思路。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以煤炭资源开发为主的中西部工业城市和以制造业、加工贸易为主的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

然而, 美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 大批人口涌

* 作者简介: 吴 军, 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讲师, 社会学博士、城市学博士后, 北京, 100000。

入城市,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城市兴起,有些学者在传统城市发展理论中加入了新要素,即人力资本。代表学者有西奥多·舒尔茨^[4](Theodore W. Schultz,1960)詹姆斯·科尔曼^[5](James Coleman,1988)、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95)^[6]。他们认为,促进城市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技能的提高与知识的积累。在这一点上,中国东南沿海的城市中已经开始意识到,人力资本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与城市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面临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有着紧密联系。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的许多城市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来推动增长发展。然而,很多制度创新的措施并没有收到很好的绩效,不是退回原处就是比原来更糟。当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7]就指出,制度创新没有获得成功(并没有带来民主进步与就业机会增加),是因为地区缺乏活力的公民生活、公民参与以及形成的社会资本,包括网络、信任与互惠规范等。因此,他给区域发展停滞开出了“药方”,鼓励市民参与、合作与信任,即培育社会资本。

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在美国被提了出来,创意阶层^[8]与城市增长发展的关系。这方面的代表学者为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他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增长发展正转入一种创新型的增长模式——创新成为经济增长、人口流动和社区繁荣的主要推动力;创意不仅改变着生活,而且还改变着城市形态和社会结构。最后,他得出结论,创意阶层对城市增长发展至关重要。可惜的是,他尽管看到了诸如创意阶层等优秀人力资本对城市增长的重要性,但他没有解决“如何吸引、聚集与涵养创意阶层”这个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特里·克拉克(Terry N. Clark)教授领衔新芝加哥学派提出了城市增长发展的场景模式。这有别于“城市作为

增长机器”^[9]范式所强调的土地、租金以及围绕此展开的其他收益所结成的团体联盟推动城市增长发展。场景模式聚焦市民文化艺术参与、消费与娱乐等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城市发展的一定阶段(后工业时期)后,原有的增长模式受到了限制,而市民文化艺术参与对城市增长发展开始变得至关重要。他把基于市民主体性的文化艺术消费实践整合到以便利设施为导向公共产品与多样性人群等元素集合形成场景(Scenes),以及场景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内容。

不同的场景可以聚集不同人群,因为场景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适宜的温度和漂亮的山水风光的场景对老年人群体更多吸引力,而如酒吧、咖啡馆、影剧院和博物馆等场景更多吸引大学毕业,或者时尚与提倡自我表达的场景更能吸引聚集年轻人群体,街头张扬违规的场景更能影响政治选举或运动,宜居与便利的场景更易影响不同群体的居住空间选择等。^[10]在新芝加哥学派看来,不同的场景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行为、居住模式、政治活动等都会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城市与地区的增长发展。

事实上,这样的研究理路其实是沿用了韦伯的传统,韦伯强调价值观与信仰等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进程的动力影响,这一点恰恰与马克思所强调的唯物史观有着较大差异。相关论点以韦伯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所谈论观点最为经典。后来的学者如政治学家亨廷顿“文化的作用”、哈里森“文化为什么重要”、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以及经济学家波特“态度、价值观、信念以及繁荣的微观经济学”等都或多或少的坚持了这样的观点。但是,多数学者对文化与发展的关注停留在宏大叙事和历史制度变迁上,反而对于中观理论的探索较少。新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就是努力把那种抽象的、宏观叙事的文化议题转变为可被普通人感知、被触摸以及政策上容易被操作化的场景上来,并能够具体运用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来。

表1 城市增长发展模型理论回顾与比较分析

发展模式	主要内容	核心要素	产生阶段	理论范式	代表人物
经典模式	公司驱动,更多工厂带来更多就业与收入,吸引聚集人口	土地、资本、劳动力和管理等	工业时代	城市作为增长机器	斯密(1768) 马克思(1867) 马歇尔(1890)
人力资本模式	教育学习驱动,通过教育、培训与保健等劳动力供给	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多少与质量高低	工业时代向后工业转变	/	舒尔茨(1960) 科尔曼(1988) 卢卡斯(1995)
社会资本模式	社会组织驱动,更多参与与自治传统	社会资本,如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与互惠规范等	工业时代向后工业转变	/	托克维尔(1840) 帕特南(1990) 福山(2001)
创意阶层模式	创意阶层驱动,3T理论,即技术、人才和宽容度	创意资本,创意创新并非专业人士特权,与学历无关,鼓励大众创新	后工业时代	城市作为娱乐机器	格莱泽(2000) 克拉克(2004) 佛罗里达(2006)
场景模式	文化场景驱动,市民文化艺术参与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文化资本,居住社区层面、便利设施、多样人群等集合场景,及场景中价值观、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等。	后工业时代	/	沃斯(1938) 克拉克(2010/2014) 王国平(2007/2010)

二、城市增长发展新视角:文化因素和场景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本文认为,经典模式是城市增长发展的1.0版;它指出了土地、劳动力、资金和管理等元素对城市或区域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但忽略了知识技术等无形要素。^[11]同时,城市增长发展的社会资本模式强调了市民参与和社会资本对于区域的制度创新带来重要的绩效影响。如果说把经典发展模式定义为1.0版本,那么,社会资本驱动就演变成了城市发展的2.0版本。后来被提出的人力资本模式和创意阶层模式可谓是城市增长发展的3.0版。人力资本模式强调技能提升与知识积累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而创意阶层模式是人力资本模式的延伸与创新。他们都在论述知识经济时代下“人才”的重要性。但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以人力资本为主,而后者更强调人力资本所持有的“创意能力”与“创新精神”。^[12]所以,无论是能力,还是精神,本质上还是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这也是本文把这两种模式同时列入城市增长发展3.0版的原因。不过,二者的资本形成、培育方式有着较大差异;前者是通过教育与培训,而后者通过环境、文化氛围以及天生的禀赋等。但总的说来,这两种模式都看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优秀人力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但却没有解决如何有效地吸引人才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场景模式开启了城市增长发展的

4.0版。该模式聚焦城市增长发展的文化动力,尤其是市民文化参与、消费与娱乐等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事实上,场景理论谈论的“文化”,并不是抽象和模糊的,而是在居住区层面(Neighborhood),由便利设施(amenities)为导向的公共物品、多样性人群与实践等集合形成的场景,以及场景中蕴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质量,影响着诸如创意阶层等人力资本流动与聚集,推动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这一点上区别于工业城市发展所依靠的土地、资金、劳动力和管理等传统方式。

场景理论中的“场景”一词来源于“Scenes”的翻译。根据“场景”在电影中的应用来看,它包括对白、场地、道具、音乐、服装和演员等影片希望传递给观众的信息和感觉。在场景中,各个元素的关系是相互有机关联,同质元素布局之间有必然的出现关系,异质元素布局之间将表达颠覆性的思想。克拉克将这种现象引入到城市社会的研究中,进而形成了场景理论。^[13]场景的构成有多重维度,但至少可以从以下7个维度来把握:(1)居住区(Neighborhoods),而不是城市、大都市区、州、省或民族等;(2)物质结构(Physical Structures),更多是指向生活文化娱乐设施(amenities),如舞蹈俱乐部、俱乐部沙龙和购物商场等;(3)人群(Persons),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教育、职业和年龄等;(4)1-3的特殊组合和嵌入到组合中的活动,如青年创业沙龙或朋克音乐会等;(5)这四个因素所表达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这种价值可以定义地方发生的经验中什么

是重要的,我们强调的一般意义包括合法性(legitimacy) 定义正确或错误的生活方式;戏剧性(theatricality) 看与被看的一种吸引人方式;真实性(authenticity) 真的或假的身份认同;(6)公共性(Publicness)——而不是独特个人性,强调由公共空间所展现的场景,它们对过路人和活动热衷者来说是可获得的;(7)政治和政策;尤其是关于如何形塑、维持、转变或者生产一种给定场景的政策,关于某种场景如何吸引或排斥居民、公司和游客,抑或关于一些场景如何协调政治敏感、选举模式和新社会运动等。^[14]事实上,“场景”这个概念已经超越了设施与活动集合的物化概念,它是一种涂尔干所描绘的社会事实,是作为文化与价值观的外化符号而影响个体行为的社会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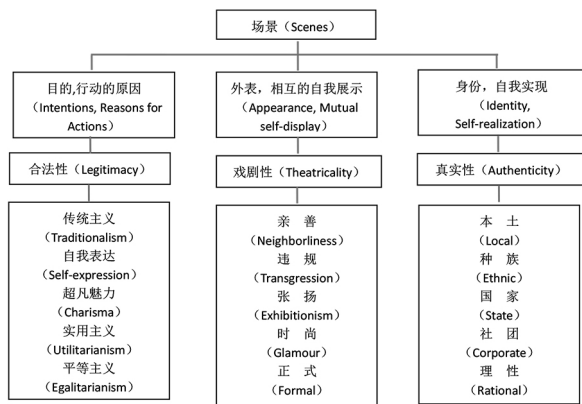


图2 场景的语法:15文化价值观维度^[16]

场景理论的研究体系建立在主观认识和客观结构两大体系上。^[15]客观结构由被研究区域中的便利设施(Amenities)构成。通常,我们将拥有大量商铺的城市区域称为商业区,拥有大量工厂的城市区域称为工业化。场景理论中客观结构的概念类似于此,不过更为细化。比如,咖啡馆、酒吧、书店、博物馆、艺术画廊,以及朋克音乐会、文化沙龙、娱乐俱乐部活动以及音乐艺术节等等。主观认识体系是指场景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根据对场景定性经验的三个一般维度:戏剧性(theatricality)、真实性(authenticity)和合法性(legitimacy),我们清楚地说明了场景生活的这种内在环境。克拉克和丹尼尔进一步拓展这三个维度,在场景文化价值观三

大维度上进一步区分了十五个小维度,以更好解释当前人们日益复杂且分化社会生活和价值构成。见图2。

场景语法的15个文化价值观维度。首先,“合法性”是指人们对什么是有价值生活方式的判断。它判定的是,什么是对的或什么是错的;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建构社会消费的合法性,如何塑造社会成员的信念和意图。合法性分为5个次级维度: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自我表达、超凡魅力(charisma)、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不同文化价值观场景的组合,在逻辑上是可行的。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介绍两种文化价值观场景来说明15个维度何以独特的方式组合成推动城市发展转型的核心动力,这不同于发展的传统模式与人力资本模式两个动力命题。克拉克认为,韦伯只用了三个维度^[17]来“捕捉”合法性,而场景增加了平等主义和自我表达。他强调,平等个人主义的崛起,连同自我表达与波西米亚式的违规,已经在艺术家和粉丝们群体当中得到了强有力传播。粉丝们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场景。文化参与的民主化是一个关键性的发展,它预示着大量全球性变革。这在东方与西方、年长者与年轻人、传统与社会解放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使某些东西对于一些人群来说比较“酷”(cool),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比较厌恶。^[18]

以自我表达合法性(Self-Express Legitimacy)为例。自我表达将场景合法性根植于展现个体性格这样一种能力的基础之上。一个好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将自己独特禀赋、个性风格和她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带入到她的每个行动之中去。克拉克和他们的研究者们指出,这是一种作为道德任务的自我表达,它要求以一种没有脚本、出乎意料的方式做出临场反应、即时发挥。自我表达的议题可追溯到赫尔德(Herder)、爱默生(Emerson)、索洛(Thoreau)和美国实用主义者们(American Pragmatists)。爱默生曾说过“坚持自我,永不模仿,你拥有禀赋用一生所积蓄的力量来呈现自己的每一

刻。”女神嘎嘎(Lady Gaga)的主题曲“就这样诞生”(Born This Way)是爱默生名言的翻版:她对《时尚》(Vogue)杂志说,“我写它用了约10分钟,而它完全是一首充满魔力启发性的歌;而当我写完后,入场的大门就开了,歌就汹涌而至,就像是一种完美经历……当我开始着手写它时,(它)就注定会是一首有关革命、自由和不带偏见的歌。”全球说唱神曲鸟叔的“江南Style”(Gangnam Style)是最为非传统的一种,它在社区邻里中录制,其中展现了首尔的标志性文化价值观场景。^[19]

自我表达的合法性在以下活动场景的塑造和提升中得到证实,如喜剧剧院、街头说唱斗士(rap cyphers)、卡拉OK俱乐部强调本性并把其“生产”出来。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这样的场景已经日渐统治当代社会,从指挥家到诗人的艺术世界,并由此拓展到普罗大众。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等在《心性》(Habits of the Heart)一书中涉及到一个著名案例研究,一个叫茜拉(Sheila)的妇女表现出了宗教的潜在可能性——当被问及“是否信仰上帝”时,她回答:是的,我认可茜拉主义(Sheilaism)^[20]。

这些简单的例子展示了,有关城市发展的传统理论与文化艺术交织时,会更有解释力;因为文化艺术能够详尽诠释和放大这些参与和发展的信息和意义。因此,场景分析在解释城市增长发展等议题上是一种有力的理论和政策工具。

三、场景理论的价值与意义

关于场景与城市增长发展之间的关系,克拉克与他的研究团队之间展开了长达30多年的研究,开始于1982年他主持跨国研究“财政紧缩与城市更新项目”(The Fiscal Austerity and Urban Innovation Project, FAUI)经费由美国许多地方和多机构联合资助,总费用约1500万美金。调查对象涉及到全美1200多个城市,包括市长、议员和行政管理者等,以及其他38国际大都市,从西方国家到东欧,再到日本、韩国和日本等。前后有超过700多

位社会科学家、政策咨询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等参与,最后形成了50多部著作和300多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对美国城市更新实践与城市研究产生了较深远影响。

在2010年以前,克拉克多用“Amenities”等公共物品来突出市民文化艺术参与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之后,他进一步拓展了这项研究,以消费为基础,把后工业城市发展转型(包括更新)的新动力现象(文化艺术消费的社会现象)整合到“场景”(Scenes)这个概念中来。构建场景这个概念,把它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工具,来诠释后工业城市中市民文化艺术参与对城市增长发展带来的影响。

先前,克拉克在谈论“欧洲城的文化政策”时,曾对文化与城市更新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三个观点:其一,文化作为一种发展性手段,推动着创意城市的发展;其二,文化作为一种福利性措施,引导了城市应具有的教育特征;其三,文化作为一种传导性举措,可以借助文化场景的塑造来刺激文化消费。^[21]作为场景理论研究的“场景”,其所具有的魅力就是能够将文化的适宜性和人文特性让人们感觉出来,并使人们眼中的城市成为人们思绪与情感交融激荡、启迪互补的城市,引导公众行为,推动城市的发展。这也是场景理论关于城市发展机理的逻辑。

本文认为,“场景理论”为我们认识城市发展和社会过程提供了新视角。它以消费为基础,以便利设施(amenities)为载体,把空间看作是汇集各种消费符号的文化价值混合体。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城市空间,已经完全超越物理意义,上升到社会实体层面。注意:场景理论不排斥以生产和人力资本为主建立起来的理论,它在承认二者功能的前提下,增加了消费的维度,即从消费、生产和人力资本三者来解释城市社会变迁动力。

就如马克思对生产的研究一样,他不仅仅把生产看作生产实物,而且把其当作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来考察。异曲同工,场景理论不仅把消费当作消费活动本身去研究,而且他们还着重研究消费的社

社会组织形态。用场景来把消费组织成有意义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必须由专门的语法结构和学术词汇来表示,即场景理论。

四、在构建场景时城市政策应该考虑的重点内容

于城市政策制定者来说,如何利用场景理论来分析构建文化因素在城市增长发展中的作用呢?克拉克和丹尼尔(Daniel Silver)认为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认识:高层公共政策和本土公共政策。^[22]

(一) 高层公共政策

国家或省市政府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通过划拨资金来支持地方政府发展,但在划拨资金时有时候比较犹豫,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科学评估方法来衡量地方开支和城市发展的关系;而地方政府急需资金支持来进行城市增长发展。那么,挑战在于,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更大空间来回应本地区居民需求和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高层政府为了确保划拨资金合理运用而采取传统方法的考评量化规则。传统方法是专家体系介入。比如,邀请专家,通过大量数据和案例调查,总结出“最佳实践”的案例,然后推广。然而,这些“最佳实践”不能成功地转化为地方经验,原因在于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即使同一个地区,不同街区或邻里都会有自己的特点,这种东西叫做背景性知识(context knowledge),这是“最佳实践”成立的前提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背景性知识,基于某区域得出的“最佳实践”对于其他区域未必成立。场景理论,提供了一个评估城市增长发展全新维度,它对区域特质的强调和背景性知识的重视,使其超越了“最佳实践”的评判思维,为不同城市区域的政策制定和政策目标评估提供了新的方法。

基于此,高层政策应该注意以下三个细节:

其一,新项目和现有的设施进行整合;把现有的设施、服务整合到新的设施服务中去,形成文化场景。

其二,扮演“中间人”的角色。“Less is more”、慷慨的资金支持、宽泛的分类资助以及严格的评估制度将是宏观政策对区域发展良策。例如,社区层面数量众多的积极的、零散的微型组织在城市繁荣和社区生机勃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些政策对社区层面微型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在低收入群体聚集的区域,这些数量众多的微型组织在塑造街区场景方面效果明显,比如激发社区活力、鼓励居民参与,使街区变得孕育自律、自我表达、团结和创造性的都市场景。尽管这些组织在街区场景塑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现实中它们却很少得到资助。这涉及两个基本问题:管理和财务。由于组织过于微型,在筹资方面会遇到“瓶颈”,出资方会担心这些小的组织缺乏管理,随意性很大,如果资金给他们了,他们是否会好好利用。另外,作为一个组织要开展业务,需要独立财务和专业法律顾问,单个的社区微型组织没有能力承受这两项开支。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的公共政策就应该创建“中介组织”方面有所作为。比如联合民间资助成立中枢性组织,作为社区微型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在财务和法律业务方面给予专门支援。

其三,参与区域规划,增加区域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在推,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似乎要好一点,走的是市场化路线,优势互补。

(二) 本土公共政策

作为国家和省市高层公共政策的资金支持、税收减免以及整体协调规划,由于太过“一般化”,在塑造城市场景、更新便利设施以及保护市民组织方面效力会有一定局限。相反,本土政策制定者更了解区域特征、贴近居民需求,所制定的政策直接对场景产生影响,比如城市规划中工厂区、住宅区等划分,土地的使用,文化区域设计,公园、停车场、步行街、公共交通、广场以及街头艺术表演的倡导或禁止等。事实上,许多本土政策仍停留在“自上而下”的宏观维度上,比如所有社区(不考虑社区规模大小和已有资源限制)都要新建各种会议中心来刺激本区域经济发展。这样的政策就忽略了区域内

在的差异性(Internal Diversity)。我们承认,某些区域确实有着同质性的特点和一致性的政策偏好,不过,大部分区域并不这样。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对区域内在多样性进行回应。

这就客观要求城市领导者对不同区域的邻里社区、基本设施、特殊场景以及文化背景等进行调查。比如,要想提高居民的创造性(Creativity)和自我表达(Self-expressive)就可以在该区域建设文化场景,因为这样的设施组合体蕴含着特殊的价值取向、营造了特殊的文化氛围,从而激发和培养居民的创造力和自我表达。尽管这样的构思很好,但在传统保守的社区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不同区域内多样性是本土公共政策要考虑的重要维度。

注释:

①经济学鼻祖,《国富论》作者,他的论地租、论分工、货币与劳动工资等思想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②《资本论》作者,马克思引用了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创造价值,所以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属于生产资料,是生产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土地是财富之母。

③剑桥学派的奠基人,与亚当斯密《国富论》其名,在政治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开创性地位。

④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领军人物,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人力资本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比较深远。

⑤芝加哥学派社会学领军人物,曾任该系系主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1988年在《社会学研究》(美国)发表了“社会资本促进人力资本”的文章影响深远。

⑥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住,芝加哥大学教授,他通过介绍一个全新的由人力资本积累驱动的新经济增长模型,并对现实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考量。人力资本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在卢卡斯看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实是一种社会学习的过程。

⑦他的代表作是《使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在于,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谈区域发展。

⑧创意阶层是指依靠“创造新产品、新服务、新

理念与知识”的人员,包括IT工程师、艺术家、设计师、科学家、建筑工程师、大学教授、金融与法律等知识密集产业的从业人员。

⑨莫罗奇、罗根,城市作为增长的机器:走向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美国社会学杂志》,1976年9月, P309-332。

⑩Clark, Terry, "Amenities Drive Urban Growth",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2. 12, pp493-515.

⑪Clark, Terry,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Amsterdam, Netherlands; Boston, MA: Jai/Elsevier, 2011. 2.

⑫[美]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7。

⑬吴迪,基于场景理论的我国城市择居行为及房价空间差异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7月。

⑭Terry Nichols Clark, Can Tocqueville Karaoke? Global Contras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Arts and Development,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House, Wagon Lane, Bingley BD16 1WA, UK, 2014, pp22-23.

⑮吴迪,基于场景理论的我国城市择居行为及房价空间差异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7月。

⑯Terry Nichols Clark, Can Tocqueville Karaoke? Global Contras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Arts and Development,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House, Wagon Lane, Bingley BD16 1WA, UK, 2014, pp25.

⑰韦伯依据大量史料,把权威归纳为三种类型:传统型、超凡魅力(Charisma,又译卡里斯马)和法理型;传统型权威是指建立在古老传统和惯例的神圣性之上的权威,如通过王位继承获得的权威和服从等。按照韦伯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帝权和宗族长老的权威都是传统型的不同形式。超凡魅力型是指个人凭借超人的才能、杰出的品格、英雄主义及其创立的典范、信仰而拥有的权威,革命年代产生的领袖、伟人获得的追随和服从是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典型表现。法理型权威是指建立在对理性、法

律及官僚体制与法定授权的信任、服从上级的权威,这种权威的产生不是基于对个人的忠诚,而是依赖非人格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

⑮ Terry Nichols Clark, *Can Tocqueville Karaoke? Global Contras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Arts and Development*,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House, Wagon Lane, Bingley BD16 1WA, UK, 2014, pp24-25.

⑯ Terry Nichols Clark, *Can Tocqueville Karaoke? Global Contras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Arts and Development*,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House, Wagon Lane, Bingley BD16 1WA, UK, 2014, pp25-26.

⑰ 这里说明了美国宗教信仰的高度自由化,也印证了自我表达在美国社会中的合法性程度比较高。

⑱ 吴迪《基于场景理论的我国城市择居行为及房价空间差异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7月。

⑳ 吴军、特里·N.克拉克《场景理论与城市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1月。

参考文献:

[1] 克拉克等,吴军译,一起卡拉OK VS. 独自打保龄球:西方规则转为发展与民主驱动力的场景诠释[J],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6期

[2] [美]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7

[3] 祁述裕《文化建设九讲》,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12月。

[4] [德]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2009. P131-165

[5] [德]韦伯著;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时代》,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7] 吴迪《基于场景理论的我国城市择居行为及房价空间差异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

[8] 吴军、克拉克《场景理论与城市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期。

[9] Clark, Terry,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Amsterdam, Netherlands; Boston, MA: Jai/Elsevier, 2010

[10] Clark, T. N., Lloyd, R., Wong, K. K., & Jain, P.. Amenities drive urban growth.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2(5): 493-515

[11] Glaeser, E. L., et al.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section of citi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5(1): 117-143

[12] Wu, Cary. Moving from Urban Sociology to the Sociology of the Cit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015): 1-13

责任编辑:禹兰